

目前,我国1.42亿投资者中95%以上为中小投资者,个人权益保护工作愈发重要——

投资者呼唤专门立法升级权益保护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热点聚焦

近段时间,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外围经济形势影响,一些特定领域的金融风险开始凸显,违法违规行多发,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任务愈发重要。同时,随着退市制度改革大幕拉开和资本市场国际化快速推进,退市与跨境投资者保护中的新问题,也有待解决

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保护,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目前,我国有1.42亿投资者,95%以上为持股市值在50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投资者权益保护事关上亿家庭切身利益。近段时间,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外围经济形势影响,一些特定领域的金融风险开始凸显,违法违规行多发,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任务愈发重要。

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简称“投服中心”)联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共同创办的首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日前在北京召开,聚焦当前投资者保护工作。

投保体系初步形成

2011年,证监会成立了投资者保护局,统筹推动全市场的投资者保护工作。2014年,投服中心成立,这是专门为中小投资者服务的公益性机构。与之前负责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一起,构成投资者保护工作的“一体两翼”,初步形成了证监会投保局牵头抓总、投保基金和投服中心等专门投保机构具体落实,交易所、行业协会、派出机构等系统各单位共同参与,市场经营主体履行主体责任的投资者保护体系。

投资者行权难、维权难,一直是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难点。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投资者行权维权新路径正在探索深化中。

比如,持股行权是由投服中心持有每家上市公司1手股票,以普通股东身份参与公司治理,为中小投资者如何行



权进行示范,通过股东自治方式从内部督促公司规范运作,成为外部监管的有益补充。

再比如,支持诉讼是针对中小投资者法律知识欠缺、诉讼成本高等实际情况,由投资者保护专门机构免费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诉讼代理等服务,改变了投资者为诉讼东奔西跑的困境。

又比如,先行赔付是针对中小投资者获赔难而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支持市场主体主动担责,先行赔付投资者损失,再向其他责任主体进行追偿。目前已有欣泰电气欺诈发行先行赔付专项基金等3个实践案例,共计约3.4万名投资者获得超过5亿元补偿金。

我国法律尚未规定集团诉讼。如今,示范判决正在探索中。这是针对证券市场同类案件存在的多方起诉、重复审理等问题,建立“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判决机制,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快速解决争议,目前首例案件已由上海金融法院受理。

加大司法保护力度

没有处罚就没有监管,没有赔偿就没有保护。证券行政监管与证券司法审判是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两大主要力量。但目前,公众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获得权利救济的渠道仍有限,司法赔偿还不能覆盖资本市场的主要违法行为,社会各界对加大司法保护力度的呼声很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刘新华在论坛上表示,要进一步结合《证券法》《公司法》修订、《期货法》起草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制定和修改,扎实做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法治建设的顶层设

计,夯实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根基”。他建议,适时制定专项的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法规。

与之呼应,投服中心总经理徐明呼吁,尽快制定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条例。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投资者保护法,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不是针对资本市场投资者制定的。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制度,在效力和层级上均显不足,在司法实践中也并不必然成为审判的依据。该短板需要尽快补齐。

刘新华还建议,建立以投资者损害赔偿救济制度为重点的新制度,特别是在和解赔偿制度、先行赔付制度、责令回购制度、公开承诺制度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建议,要着力解决投资者举证难和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后的查证、认证难等问题。比如,在解决认证难问题上,探索建立中立专业第三方就证券侵权事实、损失数额等予以专业鉴定的制度,这类类似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借助专门的医疗事故专门鉴定制度解决事实认定和赔偿责任确定等难点问题。

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长安青松认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是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之一,与信息披露制度共同构成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台柱。国际证监会组织明确要求,凡是向客户推荐产品、提供投资咨询、开展全权委托业务的经营机构必须对投资者进行适当性评估。他建议,在证券法修订时,确认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完善制度结构,在资本市场“基本法”中提升投资者适当性原则的地位和功能意义。

退市与跨境保护待破题

随着A股退市制度改革大幕拉开,退市中的投资者保护问题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之一。针对退市或即将退市的公司,如何发挥投服中心持股行权的作用,带动和帮助中小投资者维护合法权益?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刚认为,针对主动退市的上市公司,持股行权的重点在于积极行使股东的知情权和建议权。对于被强制退市的上市公司,持股行权能够起到诉讼维权的示范作用。比如,对于上市公司因存在欺诈发行而强制退市的情况,投服中心可发函要求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按照公开承诺回购或者收购全部新股,赔偿中小股东的经济损失。

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跨境投资者保护问题也开始破题。

证监会有关人士表示,投资者保护工作要嵌入到各个业务中去,包括原油期货、沪伦通等新业务。同时,探索跨境投资者保护制度安排,特别是在赔偿方面的安排。

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秦跃红表示,资本市场国际化中面临巨大制度差异,比如,信息披露、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等,都需要去调整。“对于跨境投资者保护,从制度上是有规范的,至少不低于境外投资者保护。”秦跃红说。

实际上,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比国内的投资者保护环境要复杂得多,难得多。徐明表示,虽然在境外市场投服中心是持证行权,但要充分认识跨境交易和发行中的投资者保护的复杂性,未雨绸缪。

财经观察

日前,银保监会公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简称“理财新规”)。作为资管新规配套的实施细则,理财新规进一步细化了银行理财监管要求,稳定市场预期,引导理财资金以合法、规范形式进入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并有利于统一同类资管产品监管标准,逐步有序地打破刚性兑付,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过去,由于银行在理财产品的销售上存在着不规范行为,出现过很多乱象,如将理财产品与储蓄存款混为一谈,客户明明是到银行办理存款,却被销售人员“忽悠”购买了理财产品;有的销售人员未按规定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估,向客户销售超过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有的故意夸大产品收益,结果产品到期后收益与预期相差较大,引发纠纷。

此次银保监会发布的理财新规不仅明确了理财产品与结构性存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还对银行理财产品销售行为进行了严格规范,同时还放宽了银行公募理财产品的投资渠道,允许公募理财产品通过投资各类公募基金间接进入股市,等等。由此可见,银行理财产品已由过去的保本保收益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投资者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稳获收益,而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当然,从保本保收益到要承担风险的观念转变,还需要给投资者一段适应的时间。特别是理财新规降低了银行理财的销售门槛,相应地投资者也会增加,这些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不一,因此需要银行不断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提升风险意识。

为此,笔者建议,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切实加强理财新规的宣传,加强对投资人的理财投资风险教育,让广大投资者真正了解理财投资存在的风险,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收入状况合理进行理财投资。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严格规范理财产品销售行为。不折不扣地执行政理财产品销售相关信息登记制度,防范“虚假理财”和“飞单”。杜绝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防止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严格执行不少于24小时“冷静期”的规定,对于投资者“冷静期”内改变决定的,银行应当遵从投资者意愿,解除已签订的销售文件,并及时退还投资者全部投资款项。

此外,商业银行还要加强对理财资金投资风险的管控,严守理财新规在理财产品投资运作范围和比例方面设定的监管红线,同时监管部门也应进一步强化监管,促进商业银行理财业务规范健康发展,依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市场动向

卖出“白菜价”并非要打价格战——

“报行合一”促车险市场更理性

本报记者 李晨阳

商业车险手续费率实施“报行合一”已满2个月,很多车主表示,车险优惠力度相比上半年明显降低,返现赠礼也在减少。

据悉,为遏制险企之间恶性竞争,银保监会要求自8月1日起,在全国33个地区正式开始实施“报行合一”,即险企报送给银保监会的手续费用,必须与实际执行政策保持一致。同时,行业统一手续费上限,不得以任何形式突破。这里所指手续费是向保险中介机构和个人代理(营销员)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手续费、服务费、推广费、薪酬、绩效、奖金、佣金等。

今年3月份,原保监会推进商车险费率第三次改革,四川、山西、福建、山东、河南和新疆迎来商业车险自主定价范围调整。1个月,银保监会发文批准在陕西、广西以及青海三地开展商业车险自主定价改革试点。

“这意味着,第一次商车险费率改革将保费和出险次数相挂钩,第二次商车费改让‘好司机’的保费更加优惠,目前第三次商车费改则把车险的定价权完全交由市场决定。”业内人士表示,保险公司在获得车险自主定价权的同时,难免用低价保费吸引消费者,从而争取市场份额。据了解,第三次商车费改以来,部分地区开始“挥泪大甩卖”,1年期商车全险保费低于千元也不足为奇,甚至有包含1年期保额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在内的一份车险产品仅售百元有余。

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车险卖出“白菜价”并不代表新一轮价格战开始。一方面,车主风险越低,支付保费越低,但低至几百元的保单难成主流,因为只有符合多年不出险、没有交通违规等条件的车辆才有可能支付如此低的保费;另一方面,几轮商车费改后,财险公司的共同诉求是实现车险业务不亏损,这就需要车险价格必须覆盖成本,从而决定了车险价格不会太低。

值得肯定的是,“报行合一”的实施,强化了险企的费用管控,保险公司车险费用率随之降低,这不仅有助于改善承保利润,还会引导更多险企将费用投入到提升客户体验以及风险管控中,优化服务水平,推进行业良性发展。

本版编辑 孟 飞

提升小微金融 台州使出“三板斧”

党建+金融 着眼软信息 标准来引领

本报记者 彭 江

三州乡位于浙江台州天台县县城西北部,九山半水半分田,因地处台州、金华、绍兴三市交界而得名。三州乡太过偏僻,崎岖的山路更像个拦路虎,把金融机构挡在了外面。

2016年,泰隆银行推行“党建+金融”普惠新模式,在三州乡开展了金融移动服务站试点工作,很少享受过金融服务的三州乡迎来了自己的专职信贷员。是什么让银行愿意走进深山,沉下心来发展普惠金融?

解决信息不对称难题

台州是国内唯一拥有3家城市商业银行法人机构的地级市。多年来,泰隆银行、台州银行、民泰银行在小微金融服务的创新和品牌建设上创出了“小微金融服务台州模式”。

记者发现,台州银行业在创新小微金融服务模式时有一个新亮点,就是将金融服务与基层党建密切联系。据台州银监分局相关负责人潘湖滨介绍,2017年以来,台州银监分局提出“好党建引领好银行”的思路,率先探索“党建+普惠金融”发展新模式。截至今年7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党建+普惠金融”累计投放专项红色信贷11.8万笔,授信近200

亿元,支持15.2万群众走上致富道路。

泰隆银行副行长金学良说:“‘党建+金融’首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信贷员通过基层党组织能很快了解到乡村人员的情况,确定资金投向。该模式还降低了不良贷款的发生。党员一旦发生借钱不还的情况,还有基层党组织做工作督促其还钱。”该模式下的信贷员,也被当地百姓称为“红色信贷员”。

潘湖滨称,台州银监分局支持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构造优配强“红色信贷岗”,为每位“红色信贷员”划定片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分批派往偏远山区和金融服务薄弱区。同时,发挥全省社区支行转型升级的试点区优势,将社区支行设到城乡接合部、非一线集镇,为每个站点配备至少1名“红色信贷员”,打造金融服务“红色桥头堡”。截至2018年7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聘任“红色信贷员”近2000名,为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探索适合的风控模式

一般来说,去银行贷款少不了抵押物。可是小微企业往往会面临抵押物不足的情况。为破解小微企业缺乏抵押物、管理信息不透明难题,台州3家本土城商行放弃“抵押为王”的传统做法,不断创新

担保方式,陆续推出了“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业务”“信用保证基金担保授信业务”等,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资金缺乏、担保难、融资难以及企业互保链脆弱等突出难题。

潘湖滨称,针对小微客户无法提供正规财务数据与财务报表这一现状,3家法人城商行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一系列切合小微金融特点、行之有效的风控技术,比如摒弃机械审核企业报表,着眼软信息收集、侧面打听、交叉验证等灵活有效的风控技术。

台州银行推行了“下户调查、眼见为实、自编报表、交叉检验”为核心的十六字信贷调查技术,泰隆银行推行了“三品三表三三制”,“三品”即一看“人品”,主要考察客户还款意愿;二看“产品”,主要考察客户还款能力;三看“押品”,主要考察客户还款保障。“三表”即一看水表,二看电表,三看海关报表。金学良说:“只要有劳动意愿、劳动能力,无不良嗜好的市民、农民都能在泰隆银行获得无抵押贷款。”这大大降低了农民市民获得普惠金融服务的门槛。

复制推广取得好成效

台州3家城商行的模式也被其他银

行纷纷效仿和学习。自2013年第一家异地城商行稠州银行进入台州以来,陆续有6家浙江省内异地城商行在台州设立分行,积极开展复制台州小微金融服务模式的实践,同样取得了较好成效。

据了解,台州多家异地城商行还采取合理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措施,增加小微企业融资规模和比重,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以稠州银行台州分行修订的《信用业务风险资产责任认定与追究管理办法》为例,其将小微业务容忍率区分为分行容忍率和客户经理容忍率,对处在不良容忍率范围内的风险贷款相关责任人免于处罚。这不仅鼓励小微客户经理加快贷款投放,解除员工的畏贷惧贷心理,还促进了小微业务发展。

为更好推广“台州模式”,台州银监分局总结3家法人城商行开办小微学院的经验,推动当地开展试验区标准化试点,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规范》《小微企业信贷服务信息管理规定》《个人经营性信贷服务规范》等9项行业标准,为“台州模式”走出去做好技术准备。截至2018年8月末,6家异地城商行分支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1.64亿元,同比增长39.23%。